

# 史記

姓名以別之餘者采〔漢〕司馬遷之著

楊燕起之註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

真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

理也終縷有紀而帝王書

○正義曰蓋左中侯初

稱帝又坤靈圖云德配天

史公依此本入戴禮以黃

五帝譙周應劭家皆同

帝王世紀孫氏本皆同

少吳顓頊高辛唐虞為

本紀諸侯世家本者繫

統理衆事紀之年月名之

舉數之由以五帝本紀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正

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

曰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黃

土而稱炎帝然也此以黃

黃

## 史記全譯

〔汉〕司马迁 著

史記全译

蘇杨燕起

一册  
至卷一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涤明 等  
封面设计 邹 刚  
技术设计 玉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全译/ (汉) 司马迁著; 杨燕起注译: 一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7

ISBN 7 - 221 - 04572 - 0

I . 史 ... II . ①司 ... ②杨 ... III . ①史记—注释  
②史记—译文 IV .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706 号

史 记 全 译

杨燕起 注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4600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4001—6000

---

ISBN 7 - 221 - 04572 - 0/K·430(全九册)定价: 260 元

## 前 言

### ——司马迁与《史记》评述

#### —

《史记》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价值，使之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备受人们称赞。

《史记》的作者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依王国维说），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或稍后，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史学家，生活在汉之文、景、武时期，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享年仅50余岁。《史记》实际上是司马谈在武帝任命他为太史令时就开始写作，而最终由司马迁接续完成的，这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私家著史中父子共同完成一部史书写作的先例。

司马谈、迁父子对他们先祖在远古掌管天文观测从事星占术，和在周代开始断断续续地担任史官的业绩，感到自豪和骄傲。司马谈在担任了太史令以后，以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为己任，开始实施写史的计划。司马谈在《史记》写作过程中的贡献，可以简略概述为三方面：一，撰著了《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末叶孔子创设儒学以后所出现的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作出了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并将诸种学术论定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分别概括出各家的学术特

征，在奠定此后我国学术研究和分类的基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史记》写作提供了明确的学术认识的指导原则。二、奋然以当代周公、孔子自命，立志继《春秋》以兴盛“天下之史文”，并已经开始对历史进行了相关的考察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各方面的资料和考虑了初步的体例设计，且具体撰著了某些篇卷。三、为了培养写史的继承人，创造条件对司马迁进行了有益的培养和教育，关于这方面，司马迁后来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元封元年，汉武帝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朝廷大小官员以能随从皇帝参加这样的大典为无上光荣。行进到洛阳附近的时候，司马谈因重病不能前进了，他感到特别悲伤，恰好在这时，奉命出使西南的司马迁回来要向皇帝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见到了病危中的司马谈，司马谈叮嘱司马迁牢记“孝”德来完成自己未竟的写史事业。由此，司马迁接受了遗命，表示坚决遵从不敢疏忽。随即司马谈带着痛苦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民间，在龙山以南和黄河北岸的地区，体验了耕种和放牧的农家风情。在父亲有意识地培养教育下，十岁就开始学习《尚书》、《左传》、《国语》、《世本》一类的古文典籍，随后跟着父亲到达长安，聆听过孔安国讲《古文尚书》，董仲舒讲《公羊春秋》，为他后来学术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岁开始，在父亲的安排下，可能以“宦学”的身分周游全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三十岁前后，汉武帝任命他做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些经历，加上司马迁以后出任太史令和中书令，随从武帝出巡，他一生的足迹所及，达到了除相当于今日的长城以北和两广地区以外的当时汉代版图陇山以东的整个范围。这对于他接触并了解各地的自然风光和物土人情，以及下层民众的痛

苦等，都有极大的好处，从而也增强了他对世事的观察辨析能力，为他后来的写史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的一生，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第一件是司马谈辞世时的遗嘱。司马谈临终对他除讲述了家世的光荣历史以外，表述了自己立志作史的决心，眼看无法完成，嘱托司马迁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所欲论著”的宏伟事业，并教导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司马迁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以其“论载”来歌颂“海内一统”的汉家天下。司马迁于是在父亲面前低下头流着眼泪表示了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就是说，仅就这一短暂的场景而言，司马迁所承受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无穷力量及其所要求的坚毅品质，这对他后来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来完成《史记》写作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是李陵事件。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又因为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赎罪，而被判处了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受宫刑就意味着与宦者为伍，这使他感到极度的羞耻，曾经因此产生过自杀念头，但他还是坚毅地活下来了。“所以隐忍苟活，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以看出，还是父亲的遗训帮助他在痛苦中作出了正确选择。不过由于这一亲身遭遇，使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评述态度是更加客观冷静了许多，已经不完全是如司马谈最初设计那样的一味歌颂，而是使他能更清醒地全面认识社会，并站出来对某些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而使《史记》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和学术的生命力。

元封元年，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负责观察天象、记载史事和掌管皇家图书的事项，这期间他参加了《太初历》的制订。李陵事件后他担任中书令，其职事相当于皇帝的随从秘书，自此直到他离世前一直在历尽艰辛，利用业余时间全身

心地完成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的写作，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奉献出了一部光辉巨著，并为史学的建立竖立起一座堪称典范的丰碑。

应该看到，司马谈、迁父子之能相继完成《史记》写作，自然是他们主观努力上顽强奋斗的结果；但《史记》的成书，却也是在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之所造就。

促使《史记》在汉武帝末年完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是：西周以来，中国出现了大一统局面，虽然其后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不仅社会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发展了，而且经过秦的武力征伐，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汉家接续这个态势，至武帝时已是空前的开拓繁荣了，这就需要有一部史书来反映这一巨大的时代变化。在政治领域中，较长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大一统局面下的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并不断显露出来，人们不能不注意探求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政策方法，也需要有一部全面总结成败兴坏的历史经验的著作来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儒学产生后出现的各种政治学术思潮，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提出不同的治理社会的策略和主张。如《论六家要旨》所表明的，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材料可资凭借以帮助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得出恰当的认识上的结论。同时，较长时期较为稳定统一的局面及相关的政策环境，武帝时期的图书文献资料也已经充实到足备历史总结的需要。总之，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代，社会需要及政治、物质、思想上已为一部全面的历史著述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加上司马谈、迁父子的个人天赋和努力，《史记》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的博大精深，正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在史学上的真实体现。

## 二

《史记》在史学上的重大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撰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只有文告汇编、断代编年、地区国别、谱牒世本之类的史书，《史记》才是第一部通史。这部通史，在时间上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以至汉武帝时代，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并进入封建社会，总共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在内容上记载了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以至于医术、占卜等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地域上除主要记述汉武帝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包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视野所及为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又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这部通史的表述，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是将三千年的通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论述的文字，但实际内容是强调了中国本土上世系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影响深远的分封的形成。其他阶段特征所概述的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其高明的历史见解。

《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由于司马迁第一次清理出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它所体现的追寻往古，尊崇先民，巩固统一，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传播给后代，影响所及，使得历朝历代都不能不把这一通史的写作继续下去，虽然在形式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而断代为史，但将诸断代史连接起来，却正形成为一部各朝各代都具备的完整的通史。这种写史的制度与方法在今天诸世界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文化灿烂的光辉的地位。而能够形成这种通史规模的文化典籍的奠基人正是司马迁。司马迁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

同时，在撰史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史记》这部通史的出现，也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首先是通观原则，后代如直接标明有“通”史特点的《史通》、《文史通义》、《通典》、《通志》、《通考》、《资治通鉴》等，自然有着《史记》通史影响的痕迹，即使其他许多类别的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标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上是受着《史记》影响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通识，常常是评论史家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其次是统系原则，《史记》是记述统一、强调统一、歌颂统一的，它首先在思想上确立了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各朝各代的前后连接上，《史记》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国自黄帝以来朝廷的正宗统系，这反过来又有利于在政治思想上肯定统一，保证统一。后代史家在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时候，即使是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都注意于探寻能够代表着统系的实际主宰力量，尽管认识上各家有分歧，但均关注系统的存在却是一样的，而在这方面，正是《史记》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再是实录原则，司马迁写通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依据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档案资料，且有他亲身的实地考察采访，并加以综合考证才写出来的。司马迁赞赏古代史家的“直书”精神，努力将它贯彻到通史中去，《史记》中尽管有些记事的材料有出入，

或不一定准确，但总体来说除传说时代以外，它确是信史，这是毋庸置疑的，班固在史学观点上要批评司马迁，但他也不能不颂扬《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由此，是否具有“实录”精神，是评价后代史家著述价值的必备条件。最后是厚今原则。《史记》是通史，跨越时间很长，但它记述的重点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十二本纪，秦汉占了七篇，而这段时间共约 150 余年，在整个《史记》记事的三千年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十表，除前三表外，余七表全是秦汉。七十列传，自卷二十三、二十四邹阳、贾生以后全是记秦汉的，只有极少数篇章内容涉及秦汉以前，而其中从卷四十七魏其武安侯以后又基本上是记汉武帝时期事迹的，光汉武帝一代所记人物事迹就约有 20 篇。《史记》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写当代史，既说明当时写史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进步的时代气氛，同时也表明司马迁敢于指陈现实的巨大勇气。后代写史的条件越来越严酷些，但《史记》所确定的厚今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写出了通史，建立了我国通史写作的规模，并创设了若干可以影响后代史学发展的原则思想，它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 第二，创设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在《史记》以前有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禹本纪》、《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秦纪》、《楚汉春秋》以及年纪谱牒等所体现的多种史书记述形式，但从体例上来看都不完整、规范，至《史记》才创制了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为一体的“纪传体”史书体例。

本纪，刘知几《史通》说“天子曰本纪，诸侯曰世家”，意思是说记载天子事迹的体裁称为本纪，记载诸侯事迹的体裁称为

“世家”，这个说法只看到了《史记》运用本纪、世家体裁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了解司马迁创设的本意。就本纪而言，《史记》不只是记天子事迹，而是通过历史上帝王世系年代传承的记述，除了体现历史的时间性以外，还重在表示天下发展的大势。《史记》十二本纪中，《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是最有争议的，但正体现了司马迁的上述思想意图。《五帝本纪》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将黄帝作为中国历史大势的开创人物，并以禅让开始来体现一种德治模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般形式的编年纪事，其中德盛德衰影响政治成败的记述非常明显。按正统的观点来说，周王朝以后就是秦王朝了，自然以《秦始皇本纪》来接续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却在中间横插了一篇《秦本纪》，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诸侯国，司马迁不把它写入世家却写入本纪，这是表示在历史上秦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正是由儒家德治转入法家力治的关键步骤，不记述这一步骤，天下大势演变的原貌显现不出来，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将秦写入本纪是非常合理的。中国历史秦代后就是汉代，《秦始皇本纪》以后接续《高祖本纪》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又列出一篇《项羽本纪》，项羽不入列传，不入世家，却列入本纪，是说明项羽以武力灭秦以后，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直至楚汉相争失败，其事迹系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所以列入本纪。项羽的最终失败，也说明残暴的武力统治均会短命而亡不可久安，刘邦是个宽大长者终于取胜，说明德力统治的又一次转化。古人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是说妇人不可以主政，但司马迁和这个看法相左，不立“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吕太后，就可以将她写入本纪，勇敢地撇去了在统治权上区别男女的偏见。吕后继刘邦之后，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为而治，使生产发展了，民众逐渐富足起来，她之所行是以道家学

术为主的德力结合以德为主的统治方案，又是天下大势发展的重要一环，经文帝、景帝，自流放任的结果，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至武帝时内法外儒的公羊学说占住了主导地位，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当是这样一种天下大势思想的表述，然而这篇本纪是亡佚了，我们已不可窥其原貌。《史记》本纪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体现这个“纲”的作用的，除给予重要历史事件确定相应的时间位置及表明它的背景以外，主要价值是实事求是地表现出了历史发展中的天下大势，这是应该明确的。

表。这种体裁具有纵横交错，简明扼要，众事纷繁，一目了然的特点，它辅助本纪也起着“纲”的作用，而重要的是十表的设置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结构形式上，十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重在帝王世次，它以此为经。全表又分为两截，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的世次为纬，后半截以鲁至曹十国世次为纬，总的内容是“观百世之本友”。《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地为主，故年经（月表以月为经）而国纬，总的内容是“观天下之大势”，因此四表在年代显示上成为了十表的骨干部分，贯穿着全史。《高祖功臣侯表》以下四年表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具见汉初六朝百有余年侯家的盛衰始末，并见惠景间的四朝事势和建元以后诛伐四夷的情况，总的内容是“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记为主，年经而职纬，也就是首列纪年为经，次四格分列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旁行为纬，观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机，即可定人臣贤不肖之分，总的内容是“观君臣之职分”。其实观百世之本支，观一时之得失，观君臣之职分，也是从不同侧面考察政治事势，所以，表体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以不同形式，结合具体的事态发展，来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天下大势。

书。此种体裁，《汉书》改称为“志”，由于它是专记典章制

度的，后代演变而为书政体，而其创始之源当出自《史记》。《史记》八书，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把礼乐摆在前面，可见他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在统治中的作用，实是显示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律，本应指音律，但《史记》依司马迁自己的说法主要是记军事制度。这前三篇均已佚，今之所存学者多论定为补篇，是以难见其原貌。历，是记历法的，今之所见可能有后人的窜乱；可能由于看法上的分歧，司马迁没有记述《太初历》的制订过程和具体内容，故使人至今不能通晓它的真貌，也是一个缺憾。天官，是记天象与五行星占的，其中有些迷信思想，但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司马迁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本篇在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封禅，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大事，它可以神化皇权，不能不记，但此篇对汉武极具讽谏意义。河渠，记兴修水利，是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平准，以汉武帝时期的均输平准取名，重点是讲当时的财政策略。八篇中礼、乐、律、封禅属政治领域，历、天官、河渠属自然科学，平准属财政经济。由于草创且有缺失，八书内容不如后来《汉书》十志的那么完备、全面。其中天官、河渠、平准是《史记》中的精采篇章。

世家。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后来的正史中很少有这种体裁，它的产生确实与周初以来的诸侯分封有密切关系，但它也绝非全然如刘知几所说“诸侯曰世家”。司马迁自己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故创作世家的主旨是“拱辰共毂”维护大一统。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入世家，否则如吴王刘濞、淮南衡山二王以及韩信等都不能入世家。因为他们背叛违抗了朝廷。这是世家体裁的主旨所在。三十世家大体上分为四类，都是符合这一主旨的。一类是前十六篇春秋、战国时的列国诸侯；一类是孔子、陈涉两位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孔子一生

的学说是维护君权的，陈涉是刘氏王朝的开路人，都是名符其实“拱辰共轂”的；一类是刘氏王朝皇家的宗亲后室；一类是汉家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周亚夫父子，他们是绝对尊崇拥护汉室的。写法上大体分为两种：列国世家形同本纪，写出了各重要诸侯国各自的发展形势；其他世家形同列传，其中孔子、陈涉及汉初重臣诸世家，是《史记》中的著名篇章。

列传。这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从远古传说时代到司马迁的当世人物，总共七十篇。其中第一篇写伯夷、叔齐，实际是议论重于事迹，相当于列传的总序，表明了司马迁评述人物史事的重要观点。从第二篇管仲、晏婴起，才是实际人物的传记。历史上人物这么多，司马迁选择立传人物的标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义、时、功名、天下是基本要素。前二至七篇，除韩非、吴起外属春秋时代人物；八至二十八篇，除邹阳、贾生外属战国时代人物，其中多数人物与秦朝的兴亡关系密切；二十九至四十六篇，为秦亡汉兴至景帝时人物；从四十七篇起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其中包括九篇类传，四篇周边少数民族传及二篇涉及域外国家的传。从形式上列传又分专传，专为某一重要人物设传，此中包括少数民族传和域外国家传；合传，数人合为一传；附传，某一人物事迹附在他人传中；类传，将某一类人物汇在一起立传；自序，实为专传，因功能有别，有的学者将它单列为一类；还有一种叫附见，即在为他人写传时提及到某人的事迹功德影响，如纪信、王璜、毛遂等就是，有时附见人物的历史作用并非都不重要。司马迁记述人物，重要的是通过人物事迹来写历史，使史事具体化，它是相辅于本纪、表的“纲”以成书的。列传是《史记》中的精华部分。

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的设立，规模宏大，网罗丰富，使《史记》的记事可以达到无所不包的要求。五体结合

形成的纪传体例，是历史发展形成大一统的体现，是祖国山河壮丽所表现的恢宏气势的产物，而司马迁承受了这样的气息，如站在高山之巅俯视大地，激情涌现于胸中，构思形成于笔端而精心创制出来的，他有机地运用这种体例，实现了撰写百科全书式通史的目的。

第三，阐明了司马迁的作史思想，标志着中国史学自觉的开始。

司马迁阐明自己的写史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一家之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对此略加探寻，正足以表明司马迁深邃的作史思想。

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倡导天地人的合一，是说明人们需要认识天地自然的客观条件及其相应的规律，以规范自身的行为来适应并驾驭自然，使之为人類的利益服务；人们如果不能遵循这种规律，甚或违抗它，破坏了自然环境和条件，就会遭受报复而蒙受灾难。所以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的命题，本身就极具深刻的哲理价值。

司马迁关于“天”的认识，包含着三方面的概念。一是指自然的天，如日月五星以及风云雷电等天文气候现象，《天官书》集中对此作了表述；一是指人格神的天命、天意以至善恶报应之类，《伯夷列传》论述中的质询，较集中地表述了司马迁对这方面的怀疑态度；一是指历史事态发展中人为因素以外的各种客观条件相结合所组成的一种无形力量，而具体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作为某人成事的历史背景之类的“势”。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这第三方面的认识，接近于形成一种事态规律性的认识。司马迁讲人们可以顺势立功成名而不可违抗，反过来人们的作为又可以造势而为总的事态发展增加新因素、新力量。司马迁记事论事，很强调“时”、“势”，这就贯穿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使他在史学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汉武帝时代的主导思想是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公羊学。司马迁也是受着公羊学思想影响的，表现为他主张大一统、忠君、德治等，《史记》中也流露出某些迷信思想，但在总体上，司马迁对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相结合的学说，不仅不感兴趣，反而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他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来探究天和人之关系时，也就有否定人格神的存在的重要意义。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主张通观古今的变化，内容包含着多个方面，首先是原始察终，讲究研究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过程的变化。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对过程的始终、本末都不清楚，又如何认识历史，找寻其中的法则呢。其次是事势之“渐”，注意到渐变。他认识到一个事件的巨变，并非一朝一夕突然产生的，而是有个长久的渐变过程，《史记》中常说“所从来久矣”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事势的发展有一个形成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有很多条件变化在制约和影响历史的发展，分析掌握了其中的缘由，才有可能恰当的评价历史事件。第三是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一个很高明的见解。他认识到历史事势发展到兴盛的时候，内中常常暗藏着衰败的迹象，人们要善于观察，找出衰败的迹象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否则事势就会由盛转衰从而出现另外的面貌，《平准书》中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第四是承敝通变，一位新的政权统治人物，当他接续的是前代的破败局面的时候，就要注意找出破败的原因，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正，转危为安，以便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形成长久的新的稳定局面，从秦到汉的转变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由于司马迁能够依据原始察终、事势之“渐”、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的方法来通观历史的变化，所以他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说明，如他关于三千年通史天下大势的思想，关于由姜齐到田齐转变的认识，关于秦能统一六国原因和六国必然灭亡事理的解释，关于汉



之文、景到武帝时政策转变的看法，关于社会生产和流通对政治风气影响的阐发，无一不体现他关于通观古今变化的思想成就。司马迁关于通观古今变化的思想继承了古代《易》学、老子、荀子的变革思想，因而也是传统辩证法认识在历史学上的合理运用。

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所说的“家”，指的就是史学家，它标志着汉武时期史学的崛起和史学家在思想政治学说上独树一帜的雄心和勇气。所说的一家之“言”的标志，是他恰当地处理了几个关系。一是继承与创新。司马迁一再声明要继《春秋》作史，而且他也是尊崇至圣孔子和先代贤人的，但是他又并不全然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亦步亦趋地完全跟在圣人后面往前跑，而是结合时势发展及具体史事，作出了自己的恰当结论和评价，体现出他勇于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所以《史记》是一部极具首创精神的名著。二是学术与政治。司马迁认识到各种学术思想归根到底都是服务政治的，都要为解决现实政治生活的难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而已，正如其父司马谈所说“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所以《史记》在记述学术人物时，着重指出他的政治主张并给予评价。他自己写史从事学术活动是勇于面对现实，指陈是非的，他的看法有时和当朝政治措施不一致的时候，就称述直谏，并对他认为失误的举措敢于提出批评，这种事例在《史记》中是很多的，它也说明了政治家和史学家认识和处理问题时的矛盾和区别。三是宏观和微观。司马迁考察天人关系，通观古今变化，追寻时势发展脉络，纵论汉家天下得失，其宏观识力高远，气势磅礴；然于项羽自刎乌江的悲壮，刘邦登皇帝位的得意，吕后待人之刻薄，文帝在位之仁德，以及蔺相如之智，廉颇之诚，韩信之谋，萧何之忠，季布之刚，窦婴之贤，李广之勇，张汤之酷，游侠之义，佞幸之媚，李斯之患得患失，荆轲之悲歌慷慨，滑稽之谈笑解难，商贾之息财